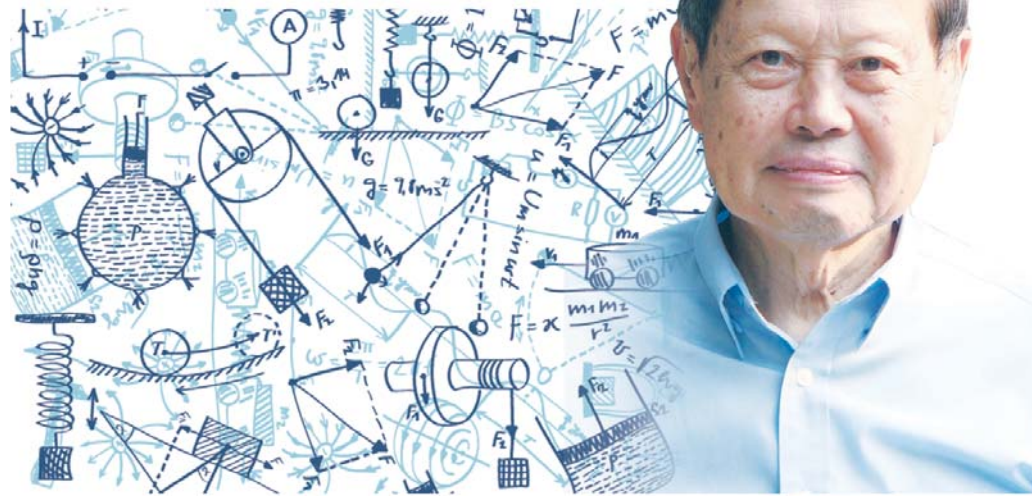


杨振宁回国记



杨振宁说,1962年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也产生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好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以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是错的价值标准。”

杨振宁、姚期智近日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的消息引发关注。杨振宁是在1964年春加入美国籍的,在此之前,新中国曾数次放出明确信号,邀其回国;其父杨武之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内瓦与其相见,任务之一就是劝其回国。

杨武之受命赴日内瓦面见杨振宁

杨武之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等,是彼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杨武之任教于复旦大学,举家居于上海。

杨振宁与家里的联络一直都很畅通。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没有证据显示杨振宁与家里的信息往来涉及回国问题,他与家里的联络更没有惊动政府。变化发生在1957年春夏之交。

1957年夏天,杨振宁应邀到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作为二战中立国,瑞士早在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建交。杨振宁一直挂念着国内的父亲,便给上海的家中发了一封电报,大致内容是说自己不久将会带着妻子杜致礼和孩子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希望父亲能到日内瓦来团聚,未见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和孙子。接到电报后,杨武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求助。很快,杨武之的请求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

据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回忆,国务院办公厅派人来到复旦大学,由她带去华东医院看望杨武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下,带病的杨武之先到北京,并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离京之前去了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看望从未谋面的亲家杜聿明先生。杜聿明托杨武之带了一封亲笔信给他分别多年的女儿杜致礼。

杨武之于6月中旬抵达日内瓦,与杨振宁一家相处数周,于8月底返回上海。在日内瓦期间,杨武之没有忘记自己向周总理的承诺,积极争取杨振宁。他向杨振宁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和新事物,并一起去中国驻

日内瓦领事馆看纪录片《厦门大桥》。据杨振汉回忆:“父亲从日内瓦回来后告诉我们,大哥和李政道于1957年初扬名世界以后,台湾即不断地派人去拉拢他们,希望他们能回台湾工作,或至少是去台湾讲学,父亲说,他告诫大哥和李政道,即使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但绝对不能去台湾。当前的形势将是中国大陆会一天天强盛起来,台湾会慢慢萎缩下去,这就是当今潮流。”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杨武之争取杨振宁回国是认真的,但“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杨武之的争取没有成功。

张文裕两次当面争取杨振宁回国

1957年10月,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故而在国内引起极大震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学通报》等主流媒体纷纷给予报道,提振人心。

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张文裕这位李、杨的老师,说服二人回国工作。当时,张文裕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国内给他打电报,让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贺李、杨获奖,同时争取他们回国工作。”据张文裕回忆,在瑞典期间,“尽管授奖活动的日程安排很紧张,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是抽时间到旅馆里看望了他,并且邀请他参加授奖典礼和瑞典皇家为他们举行

的盛大宴会”。当然,张文裕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向杨振宁和李政道转达了周总理的意思,希望他们能回到国内工作,他们听了很感动,两人都表示很感谢国内的关心。

他们说,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此外,张文裕还谈到杨武之请他为杨振宁捎信之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曾让我给杨振宁带信,信写得很长,叫杨振宁回国。”

不过,那个时候的李、杨二人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加之1957年“反右”运动的消极影响,因此婉拒了国内方面的盛情邀请。

杨武之再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0年春,杨振宁因受邀赴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再次给父亲写信,希望双亲能来日内瓦与自己团聚。国内方面同意了杨武之赴日内瓦的请求,当然,杨武之仍身负游说儿子回国的重要使命。杨武之偕同夫人罗孟华经苏联、捷克到了瑞士日内瓦,杨振平也从美国赶到日内瓦与父母团聚。当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的高潮中。在这种情况下,杨武之要想争取杨振宁,显然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据杨振汉回忆,杨武之回来后对孩子们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但是老是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又老是以中国为敌,我们又都在国内,长此以往,如何是好?而且,我写信给周总理时,曾写过我要介绍新中国的情形给振宁,希望他们毅然回国,可现在中国的研究环境比美国差太多,生活环境也不行,我很难启齿。”

母亲罗孟华则从近三四年的实际出发,向杨振宁说起上海社会生活同四年前相比的差距,杨振宁一听就觉得一定是真的,因此杨武之的劝说恐怕就很难有说服力了。

杨武之三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2年夏,因为同样的原因,杨武之夫妇得以第三次赴日内瓦,与儿子杨振宁一家团聚。彼时之中国正处于“大跃进”之尾声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中,物资奇缺,市场萧

条,人民生活日艰,杨武之夫妇对比日内瓦的市场和人民生活,自感差距岂止是天壤之别!在此情况下,杨武之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可想而知。他回国后对孩子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我写信给周总理时,说到一是劝你大哥他们一定不能去台湾,这一点看来可以做到,二是劝你大哥他们在时机成熟时回国来,现在看只能说是时机不成熟吧,这一点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觉得内疚。”

杨武之的劝说工作愈发艰难,父子冲突难以避免。1973年5月12日,杨武之先生去世。在5月15日的追悼会上,杨振宁在讲辞中对1962年与父亲的冲突有着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印象,他说:1962年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许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好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从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是错的价值标准。”这一句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1997年底,在《父亲和我》的文章里,杨振宁再次细致描写了在回国问题上发生的家庭冲突: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

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也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据澎湃新闻

相关链接

杨振宁与李政道的恩怨

194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在芝加哥初次谋面,此后,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论文《凝聚理论》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

改了过来。但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他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劝说,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

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之前,李政道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

据《瞭望东方周刊》